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HAN

汉语言文学
特色专业
系列教材



中国古文献概论

ZHONGGUO GUWENXIAN
GAILUN

踪 凡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HAN

汉语言文学
特色专业
系列教材

中国古文文献概论

本书出版承首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国家特色专业和首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国家教学团队项目资助

踪 凡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文献概论/踪凡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汉语言文学特色专业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7435-7

I. ①中… II. ①踪… III. ①古文献学-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5129 号

编 委:黄天树 陈英杰 李 红
刘敏芝 张富海 踪 凡

书 名:中国古文献概论

著作责任者:踪 凡 主编

责任编辑:徐丹丽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7435-7/1·224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3.5 印张 381 千字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编写说明

本书是专门为本科生编写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

中国古代的典籍浩如烟海,这是先民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涵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极为厚重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整理、阅读、研究这笔财富,挖掘其中可资借鉴的因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并将这份遗产传承下去,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繁体字与文言文不再通行的今天,要正确阅读、理解中国传统文献,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就是一门探讨我国古典文献的源流、形态、构成、整理、释读方法以及文献利用的科学,学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中国古典文献的基本状况和初步的文献认知、整理能力,为以后的深造打下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开设古典文献学对于提高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民素质都大有裨益。有鉴于此,许多高校都在克服师资上的困难,相继增开这门课程或者增加其课时数,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和普及已成为学界同仁的共识。

同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传统学科相比,中国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新近兴起的学科,没有全国统编的教材和教学大纲,各高校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参考资料、教育技术以及学生考核等方面都各行其是。据了解,有些高校甚至因师而异,即不同的文献学教师采用不同的文献学教材授课。因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亟须规范化管理。据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的统计,仅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之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就多达32种^①。这些教材各有佳胜,尤其是程千帆、徐有富之《校雠广义》(共四卷,齐鲁书社1988—1998年版)、杜泽逊之《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孙钦善之《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三书,不仅充分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而且有著者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建设的独特

① 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构想,价值极高。可惜的是,三者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基本构成(经、史、子、集)皆论之不详,这显然与本科教学的实际不甚相符。其他文献学教材亦大致如此。只有迟铎、党怀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四部典籍论之较详,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四部分类法源于晋代荀勗《晋中经新簿》,形成于唐代魏徵等人编纂的《隋书·经籍志》,在此后的一千四百余年为官方修书目和私家书目所广泛采用,是最适用于中国古籍的分类方法。直到近年顾廷龙、傅璇琮等先生编纂《续修四库全书》^①,仍然使用这一方法,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四部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法学、民族、史学、语言、文学、艺术、外事、科技、农学、医药、方志、民俗、宗教等方面的资料。无论是研究或者了解中国古代的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四部典籍;再扩大一点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能不知道祖先留下来的这笔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并自觉承担起爱护、研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可惜的是,目前连中文、历史或者哲学专业的不少研究生都对四部典籍感到陌生,更不用说本科生了。这是当今文科教学的极大缺漏!就拿中文(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吧,与四部典籍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两门课程。中国古代文学课对于历代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想、文学流派有极为详尽的介绍,古代汉语课对于古代的音韵、文字、训诂、语法也有比较系统的讲授,但都没有涉及四部典籍。其实古代的文学文献主要见于集部,古代的音韵、文字、训诂学著作主要见于经部小学类,如何充分了解并适当利用四部典籍中的相关资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课所应该讲授的。但非常遗憾,目前的多种《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教材,似乎都没有涉及这一点。对于系统的四部典籍的介绍,就更谈不上。有鉴于此,我们在中国古典文献学课上对于经史子集的常识进行全面、细致的介绍,以弥补当今本科及研究生教学的缺漏和不足。

迟铎、党怀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是目前对四部典籍介绍最为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其对经部书的介绍尤为详细,这是卓有见地的。十三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充分认识经部书的浩瀚以及中国古人对于经书的重视和诵习,不仅有

① 顾廷龙主编,李致忠、许逸民、王兴康副主编:《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影印。

助于我们研究古代的典籍和文化,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认识当代的中国文化。该书对于史部的介绍也较充实,可惜对于子部、集部的论述过于简略。这也许与著者的学术兴趣有关,但对于学生来讲,子部书内容之丰富驳杂、集部书文学价值之高都是应该充分了解的。因此,我们在重点介绍经部书的同时,对于史部、子部、集部书也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为了让学生对四部典籍有较为具体的认识,我们在讲授四部典籍时,还要介绍《四库全书》收录历代文献的情况,建议带领学生参观古籍阅览室,现场教给学生如何检索、利用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

除了四部典籍文献外,类书和丛书也是研究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这部分文献往往兼有四部中某两部、三部或者四部的内容,不宜纳入四部中的任何一部(《四库全书》将类书纳入子部,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四库馆臣也颇感未安),所以明代祁理孙提出了五部分类法,即:在四部之外又加上了“四部汇”一类,清人张之洞又为之命名为“丛书”。当代学者李致忠先生还提出了“类丛部”的说法,将不宜归入四部的类书和丛书另立一部^①,这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在五部之外,还有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值得重视和研究,比如幽居禁中、鲜为人知的方志文献、档案文献以及曾经风靡于世而今人已感陌生的佛教、道教文献,其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料有待我们去挖掘。至于出土文献(含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帛文献等)、敦煌文献的价值,已是人所共知,但大都略知一二,并不全面,亦需在文献学课上作系统介绍。

以上所说的五部典籍文献和其他资料,大致可以囊括中国古代的所有文献。对于这些文献的分类介绍,可以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摸清中国传统文献的“家底”,因而应该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内容。又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课相关内容的缺失,这方面的讲授就显得尤其重要。中国传统文献学中还有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目录学以及古文献的校点、注释、翻译等方面内容,讲的是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释读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目前的大多数教材都重点介绍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也曾经将这部分内容列入教学计划,但后来又删除了,理由是这些内容并非本科生急需掌握的,大多数本科生将来也不会从事文献整理工作。对于研究生来讲这方

^① 李致忠:《四部分类法的应用及其类表的调整》,《国学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402页。

面的内容却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将古文献研究方法推迟到研究生培养阶段中讲授。当然,在给本科生讲授古文献基本知识时,我们也会附带介绍最基本的文献检索和利用方法,并告知学生学术界对这些文献的最新研究情况。

总之,本教材区别于一般文献学教材的最大特色是:重视对中国古代基本典籍(经书、史书、子书、集部书、类书、丛书、出土文献和敦煌文献)的介绍,将查检、利用、研究古文献的方法渗入其中,旨在完善本科生的知识结构,弥补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的不足,并且适时进行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本教材适合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等专业全日制本科生使用,也可供研究生和广大文史爱好者参考。

目 录

绪 论/1	
第一节 “文献”含义的历史嬗变/1	
第二节 文献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5	
第三节 古典文献学研究的未来走向/10	
第一章 古文献的积聚与散佚/14	
第一节 古文献的积聚/14	
第二节 古文献的散佚/19	
第三节 古文献的清点/23	
第二章 古文献的外在形态/26	
第一节 古文献的物质载体/26	
第二节 纸质文献的几种主要装帧方式/47	
第三节 古书的版式/54	
第三章 古籍分类法的变迁/65	
第一节 《七略》分类法/66	
第二节 七分法/69	
第三节 四部分类法/70	
第四章 经部典籍概论/74	
第一节 十三经的形成/74	
第二节 十三经简介/78	
第三节 《四库全书·经部》所录之经籍/118	
第五章 史部典籍概论/123	
第一节 史部文献的产生与发展/123	
第二节 史部文献的主要体裁/136	
第三节 常见史部要籍略述/146	
第四节 《四库全书·史部》所收之史籍/157	

第六章 子部典籍概论/164

第一节 子部书的产生和发展/164

第二节 子部要籍简介/165

第三节 《四库全书·子部》所录之子集/197

第七章 集部典籍概论/205

第一节 总集/206

第二节 别集/231

第三节 《四库全书·集部》所录之诗文集/252

第八章 丛书、类书概论/262

第一节 丛书/262

第二节 类书/269

第九章 出土文献概论/284

第一节 甲骨文献/284

第二节 金文文献/298

第三节 简帛文献/306

第十章 敦煌文献概论/320

第一节 敦煌文献的发现与散佚/320

第二节 敦煌文献的内容与价值/332

第三节 敦煌学论著举要/349

后记/366

绪 论

在长达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极为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作为这种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古典文献的数量也极为浩博,内容十分丰富。同时,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术活动也源远流长,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这门学问历来被称为“校讎”、“讎校”、“整理国故”等等,而没有固定的名称。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文献学著作《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从此,学术界就以“文献学”或者“古典文献学”来指称这种专门整理、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学问。要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首先要从“文献”一词的含义说起。

第一节 “文献”含义的历史嬗变

一、“文献”的古代含义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孔子在说到前代典籍制度遗存时,曾经叹惜“文献”的缺失: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页。明嘉靖进士余文献,字可征,即取名于此。

东汉郑玄注：“献，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宋代朱熹注：“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也。”根据郑玄、朱熹的解释，“文”指典籍，“献”指贤才。张舜徽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探索于耆旧言论。言论的内容，自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在内。”^①孔子对古代文化的认识和研究，首先来自于古代典籍，通过对“六经”的整理来获取历史文化资料；此外，他还周游列国，从各地耆旧老人那里获取一些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和相关评论，以便与典籍记载相印证。孔子谦虚好学，所谓“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便是获取口头资料的过程。司马迁作为世袭的太史令，他在撰写《史记》时，首先就是充分利用国家藏书，从前代典籍中获取资料；他还“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在长期的游历过程中，又从民间耆旧那里获取大量的口头资料。司马迁将典籍记载和田野考察所得材料综合起来，才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中国古代学者“征文考献”的传统，便是从孔子、司马迁等上古先贤那里传承下来的。

自魏晋至隋唐五代，史籍中除了封谥之号屡用“文献”字样外，很少有关于“文献”的语汇遗存，而宋、元、明时期却屡屡出现“文献”一词，可参《宋史》、《元史》、《明史》等。不过，后代的“文献”大都是偏义复词，或者偏于“文”而专指典籍，或者偏于“献”而专指贤才。《宋史·儒林列传四·陆九龄》：“是时吏部员外郎许忻有名中朝，退居临川，少所宾接，一见九龄，与语大说，尽以当代文献告之。自是，九龄益大肆力于学，翻阅百家，昼夜不倦，悉通阴阳、星历、五行、卜筮之说。”《宋史·儒林列传四·吕祖谦》：“吕祖谦，字伯恭，尚书右丞好问之孙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这两条材料中“文献”指的是图书文献。元杨维桢《送僧归日本》末四句云：“车轮日出扶桑树，笠盖天倾北极星。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此处“文献”也指典籍，专指那批被徐福带到日本，在中国早已佚失的经籍。明清时期“文献”成为通用词汇，《明史·艺文志二》和

^①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页。

《清史·艺文志二》著录不少以“文献”命名的论著。明代编纂的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其初名就是《文献大成》。当时还有司马泰编纂的《文献汇编》、程敏政编纂的《新安文献志》等，其中“文献”都是指各种有价值的图书资料。

而以“文献”指称贤才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宋陆游《谢徐君厚汪叔潜携酒见访》诗中，“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之“文献”就专指博学多闻之士。《宋史·儒林列传四·陈傅良》：“陈傅良，字君举，温州瑞安人……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这里的“文献”指的是当代学者。《明史·解缙传》：“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岂不盛哉！”《清史稿·儒林列传一·白奂彩》云白奂彩“率同志结社，不入城市，不谒官府，终日宴坐一室，手不释卷。同知郝斌式庐，取奂彩论议，退而叹曰：‘关中文献也！’”均以“文献”称许好学多识之士。

“献”字专用时指贤才，后人几乎没有分歧。明焦竑撰《国朝献征录》120卷，其中“献”指当代著名人物；清李桓撰《国朝耆献类征》720卷，“献”也指人物（此书辑录清代前期230年间一万多人的传记资料，分类编辑）。

由上可见，“文献”一词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两种含义并行不悖，一种指图书文献，一种指博学多闻之士。而第一种含义的使用尤为普遍，第二种含义使用较少，并且在20世纪便逐渐消失了。

二、马端临“文献”与孔子“文献”之异同

宋元之际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是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著作。该书《自序》对“文献”一词作了具体的解释：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①

①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页下栏。

《文献通考》共348卷,分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余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等二十四门,是从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通史。

马端临对“文献”的理解与孔子“文献”的含义是一脉相承的,但又略有区别。对于前者,前人论述颇多。例如张舜徽先生说《文献通考》的取材“不外两个来源:一是书本的记载,一是学士名流的议论”,并进而把我国史学撰述的两大内容——史实和言论,上溯到先秦两汉。^①这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后者,却很少有人注意。其实,马端临所说的“文献”与《论语》之“文献”还是有所区别的,这是因为:第一,孔子所谓“文献”涉及古代文化的诸多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文学等等,内涵十分丰富,而马端临的“文献”则专指古代历史或者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内容比较狭窄。第二,孔子时代很多古籍、传说、礼仪制度还处于口耳相传中,笔之于竹帛尚不普遍,古籍的写本或抄本也很少,因此孔子所谓“献”专指口头材料;而马端临的时代印刷术极为发达,书写的材料——纸张很容易得到,印刷发行的纸质文献十分普遍,所以马氏之“文”和“献”则几乎全部是书面材料,其用义似乎与《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更为接近。马端临对其所采辑的两大类资料在行文上是作了区别的:凡顶格写的,都是“文”,是典籍中对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的记载;凡低一格写的,都是“献”,是典籍中记载的古今名贤的相关议论。

三、“文献”的当代定义

今天,“文献”一词的含义已非常广泛,历史上的各种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均可称为“文献”。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如此表述:“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加了“信息”二字,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②其中,“知识和信息”是关键词,因为它揭示了文献的本质属性:不论其物质形态是甲骨、金石、简帛、纸张、20世纪的影视拷贝,还是近年产生的电子产品,不管

①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2—3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其生成的时间是上古还是当今,不管其生成地是中国还是外国,是城市还是乡村,只要传递知识和信息,只要具有一定历史价值或科学价值,便可称为“文献”。换言之,凡使用文字、图画、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录的知识,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及各种视听资料(包括胶片、录音带、录像带、幻灯片、影片、唱片、磁带、光盘等),都可称之为“文献”。因此,“文献”一词的使用非常宽泛,如:文献纪录片,电子文献阅览室,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杂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这些表述中“文献”一词的内涵和指称对象是颇不相同的,但无不符合传递“知识和信息”这一本质特征。

第二节 文献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文献学

(一) 定义。学术界很少给文献学下定义。台湾《中文大辞典》认为:“研究一民族之语言文学,以了解其文明程度之学术,谓之文献学。”将文献学的研究限定在语言文学学科之内,显然是狭小失当的。文献学应该是以古今中外所有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揭示文献构造形态、文献整理方法和文献研究规律的科学。

(二) 研究内容。对于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历来都侧重于文献整理方法(包括版本、校勘、目录、辑佚等)这一方面。例如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称:“既称为‘文献学’就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本课定为三个内容:一、目录,二、版本,三、校讎。”^①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显然不够全面。于是有学者增加了辨伪、编纂、标点、注释、翻译等内容,这也是可以的;但还有人将文字、音韵、训诂也加以收编,并且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教材。众所周知,文字、音韵、训诂属于古代汉语的研究范围,在招生时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下的三个方向,当然不能隶属于文献学学科。

①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洪湛侯先生在《中国文献学新编》一书中对文献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十分可贵的探索。他说：“文献形体本身的特点、文献整理的方法、文献学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都应包括在内，简单地讲，文献学应包括文献的体、法、史、用等几方面的内容，并把这些融为一体，进行系统研究，逐步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①《中国文献学新编》一书，便分为形体编、方法编、历史编和理论编四个部分，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我们认为，洪先生所概括的体、法、史、用四个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较强的学理性。不过，其中的“形体编”仅仅包括文献的载体、体裁、体例、体式四个方面，只讨论外在形式，似乎略显单薄。如果加上文献的内在结构（或曰基本构成），就能对文献进行更为全面的揭示。因此，我们不妨把“形体编”扩充一下，改为“本体编”或者“本体论”。如此，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方面：

1. 本体——文献的物质载体、外在形态与基本构成；
2. 方法——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等；
3. 历史——文献学形成、发展、演进的历史；
4. 理论——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理论和思想。

目前的文献学著作大都集中在第二方面的讨论，而对于其他三个方面几乎没有涉及或者论之不详，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三）分类。由于“文献”的内容相当广泛，因此，文献学的内容也就非常丰富。从科学的分类上看，文献学可以分出许多分支学科。

根据文献内容可分为：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民族文献学、政法文献学、方志文献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科技文献学以及其他特种文献学。

从时代上看，文献学又可分为古典文献学（或古代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

从国别上看，又可以分为中国文献学和外国文献学。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有一部分学者在使用“文献学”这一名称时过于随意。笔者曾经见到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打开一看，原来是关于科技文献的检索和利用的，并不适合文科师生使用；而大多数所谓的“文献学”著述，实际上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严格地讲，这都是不科学的。

^① 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二、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清帝退位(1911)之前的各种文字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涉及面相当广泛,诸如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法学、民族、史学、语言、文学、艺术、外事、科技、农学、医药、方志、民俗、图谱以及宗教经典等等),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形态及基本构成、古文献整理的内容与方法、古文献学史、古文献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对于古文献整理的内容与方法,目前的著述颇为丰富,但人云亦云者较多,需要充实、深化;对于古文献学史的研究,以孙钦善先生的《中国古文献学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最为详赡;对于古文献学理论,目前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史”、“论”皆属于专门之学,本教材不予讨论;“法”的内容亦较深奥,我们拟后置到研究生阶段再加以讲授。考虑到目前本科生的知识结构以及毕业后的去向,本教材拟集中讨论“本体论”的内容,包括:1. 文献学课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的阐释;2. 古典文献的收藏与散佚;3. 古典文献的物质载体和装帧形态;4. 古典文献的基本构成(按照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类丛部的五分法对每部的文献构成状况及其重要典籍进行详细介绍)。其中以五部典籍的介绍为核心内容。当然,在介绍五部典籍时,也会涉及一些关于古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辑佚、检索等“方法论”方面的知识。

本书在介绍有关研究成果时,会注意从史的方面进行叙述、探讨。由于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确立了20世纪以及未来的学术走向,必定是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管从事古代史、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科技史、医学史、音乐史、天文史等哪个领域,只要涉及古代文献,就无法避开相关的出土文献。因此,本书在介绍相关内容时,也会对出土文献及其研究成果进行关注。

还需要指出的是,与汉语言文学(中文)专业下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相应,历史学专业下又有历史文献学课程。其实两门课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以及课程的板块结构是大致相同的,只是在举例时各有侧重,中国古典文献学多以古代语言文学典籍为例,而历史文献学多以古代历史典籍为例而已。两个专业的本科生只需修读本专业课程即可,无须跨专业选修。

三、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意义

(一) 学习古典文献学知识是阅读古书、整理古籍、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自觉地担当起保护中国古典文献、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敦煌经卷是一大批从北魏到唐末五代时期产生的极有价值的古代文献,它的发现者是清末王圆箎(俗称王道士),时间在兵荒马乱的1900年。王道士没有文化,认识不到这批文献的价值。他曾经拿着部分经卷去讨好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翰、安肃道道台廷栋,廷栋还把部分经卷送给了甘肃藩台,但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批文献的价值,随意转售或者送人。于是在1900年之后的几年中,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箎手中骗走了大量的经卷,使得数万卷珍贵文物流散到国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的中国不是战乱年代,如果王道士和见到经卷的甘肃官员具有伯希和一半的眼光和水平,这批文献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相反,甲骨文献的发现者是著名的文字学家、爱国人士王懿荣,他发现所购“龙骨”上有古文字,便大力收购“龙骨”,并想方设法寻查这些文献的出土地点。后来国民政府又组织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挖掘,使这批文献得到有效的保护。目前大批甲骨文献都保存在国内,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学习文献学知识,能使我们认识到古代文献的价值,并且自觉地保护它们,利用它们,传承它们。

当然,研究和利用古典文献,更离不开有关的文献学知识。古文献研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古籍整理水平的高低;古文献理论的正误,直接关系到古文献整理工作的成败。对古书乱加整理而古书亡,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加强古文献学的修养,不仅可以提高古文献整理的水平,而且可以端正古文献整理的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此外还能够提高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二) 学习古典文献学知识是提高个人修养、完善知识结构的需要

美国电影《斯巴达克斯》是好莱坞大片,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轰动。但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在出征时散发的是